

民初广东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

周 兴 昶

〔摘 要〕 本文依据民初革命报刊的新史料,对 1912~1913 年间广东军政府的教育改革,及当时广东学校正规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说。说明广东教育司民初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为广东资产阶级教育新体制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广东当时中小学、师范及专门学校等正规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及以社会通俗教育和厘正礼教风俗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教育的举办和开展,使广东的文化教育在通向近代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关键词〕 民初 广东 共和 文化教育

1912 年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的建立,对文化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广东的资产阶级教育家钟荣光等为适应当时社会新旧变革形势的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力发展普通学校教育和推行社会教育,并同文教战线上的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和排除各种阻力,力图在广东全省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以为壮大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服务。广东民初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反映了那时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特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开拓精神,表达了他们尝试用民主共和精神来重建与发展新式教育制度,及以此为建设资产阶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服务的决心。

一、教育司对全省文化教育的整顿改革

广东在 1911 年 11 月独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各属正常秩序一时难于恢复,致使教育大受影响。1912 年 5 月钟荣光受命接任广东军政府教育司长后,一些学校尚停学未能开课;已复课的学校有的也“学者教者,两无兴味,咸有去志”。^{〔1〕}面对这种严峻的教育形势,钟在任内遵照孙中山回粤期间关于“切实整顿学务”的面谕,以发展新教育为己任,对广东的教育“远猷硕画”,“大加改革”,^{〔2〕}力图发挥新式教育在民主共和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钟荣光及其领导的广东教育司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来整顿改革广东的文化教育:

第一,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破旧立新,力图确立资产阶级教育新制度。钟荣光接任司长后,“一意施行民主国教育”,自谓“学风之活泼吾取美国”,“学制之划一吾终取法国”。^{〔3〕}他参照欧美的教育制度和依据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教育方针和条令来制定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本文 1996 年 4 月 18 日收到。

教育大纲,“提纲挈要,筹划进行”。此举深得外人称颂,“咸谓其教育大纲深合社会状态,将来粤省学务当有起色云”。^[4]

钟荣光制定的“教育大纲”目前尚未见到,不过我们从其当时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民初广东的教育体制改革大致有4个新的特点:(一)、在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方面,努力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钟荣光主张民主办校,令各校设立校评议会,凡学校之重大事项均须交付评议会讨论,“由校长会同教员议定而行,既行则不应徇学生之意而变更”;教育司则提倡各校师生成立恳亲会,并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体育会,以“助学校管理之不及”。^[5]钟荣光又锐意改革教材内容,令中小学校废除读经课,禁止状元幼学诗的出版,重印清末广东教育家陈荣衮为开民智而编的《改良绘图妇孺三四五字书》,作为小学的启蒙读本;教育司则通飭各地在进行通俗教育的宣讲活动时,应“废去前清十六谕,改讲民国共和新书”。^[6](二)、在教育培养目标方面,强调德育为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司为改变前清学堂教师只教书不育人,学生于“读书而外不知培养道德、操持体魄”的流弊,^[7]通飭各地学校“于孔诞日举行纪念,由校长、教员召集学生演讲孔子之道德学说,籍以训练学生提倡德育,毋稍怠忽”;^[8]钟荣光在核准广州女子体育学校立案时,要求学生“于习体育之中,仍以德育、智育相辅进行”。^[9]教育司还在课程设置上要求各校开设运动课,及图工、缝纫等手工课,以使“民国男女,人人应有生活之智识技能及健全之体魄”。^[10](三)、在教育发展规划方面,主张普通教育、实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和男女教育并重。教育司颁布的督学局章程明确规定:各属督学局的职责就是负责维持与举办“关于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之事务”。^[11]鉴于前清封建教育轻视甚至剥夺女子受教育之权利,钟荣光特别重视兴办与发展女学,通飭各督学局长应注重男女教育“双方并行”,强调民国欲普及教育则“尤应养成一般女子皆具普通知识”。^[12]教育司对各属封建士绅阻挠破坏女校的行径,严加究办。(四)、在学校的教学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工作包括派员查明各属学校的情况,实行去劣存优;划一各类学校的名称及各校学生年级的编制与称谓;根据实际需要增减学校的课程,改良教学管理与教授方法;调查广州市学龄儿童人数拟施行强迫教育;实行小学男女学生同校等等。

由上可知,广东教育司把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建立适合于民主共和制度要求的资产阶级教育新体制,视为急不可缓的一项任务。它上述各项围绕着这一目标的改革举措,初步绘制出近代广东教育新体制的蓝图,为广东的文化教育迈向近代民主化指明了方向。

第二,整顿健全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加强对全省文化教育的指导。钟荣光整顿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的工作首先从教育司本身做起。广东反正后的教育部(民元2月遵南京政府教育部令改为司)设有总务、专门、普通、图书4课,人浮于事。钟任司长后,裁汰全司课员30多人,将原专门、普通、图书3课合并为学校教育课,选派留美教育学硕士唐萱任课长;保留原总务课,派周桂年为课长;新增设社会教育课,委任留美法学士梅鹏海为课长。经过如此整顿后之省教育司,时评称之“编制甚为得宜”。^[13]

接着,钟荣光积极筹设广州及各县的教育领导机构督学局。他认为“教育之要,贵有统一之规划,尤其有辅助之机关”,^[14]并为此请准都督胡汉民令广州及各县裁撤教育课员,自筹经费设立整顿学务的行政机构督学局。1912年6月中旬,教育司颁布了

《广东督学局章程》14条,规定先在广州设立督学局以为各属倡,各县民政长在文到一个月内应设立县督学局一所,局长由教育司选派委任。它特别强调“督学局为教育行政机关,局长受责于广东教育司,提倡及整顿局治范围内一切学务”,它的8条职责内容包括划分学区,委派局员、各校长及教育主任,规划学务兴革事宜,防范阻挠破坏学务之行为,举办与维持普通、实业及社会教育的各种事务等。^[15]该年夏秋间,广州市及各县的督学局相继成立后,办理多能一致。它们在领导各属的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冬,各督学局被临时省议会以经费不继为由议决裁撤后,教育司“不得不思补救于万一,乃请准于每县复设教育课员助县知事教育行政之外,更设一县学务专员担任地方学务”,^[16]指导教育事业之进行。

我们从钟荣光和教育司整顿健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广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教育领导权的高度重视。民初广东省教育司及其下属各县督学局与学务专员之设立,加强了对全省文化教育的统一领导,为各属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组织领导方面的保证。

第三,调动全省办学人员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共同担负振兴新教育之责任。钟荣光接任司长未久,就着手准备召集各县学界领袖参加的教育会议,以振兴全省学务。1912年6月中旬,教育司拟订出《广东全省教育大会简章》,规定这次会议“以邀集全省地方督学局长研究教育要义、办学方法、教育行政权限,务使全省教育发达为宗旨”。8月上中旬,广东第一次教育大会在省优级师范学校内举行。在10多天的会议中,钟荣光“日到会场,分时接见各会会员与之详谈学务”。与会代表听取了教育家的演说,讨论了设立模范学校、招收学童入学及举办社会教育等问题,并进行了有关的观摩学习活动。^[17]这次宣示教育方针、研讨全省学务进行的大会,统一了全省办学领导骨干的思想,调动了他们的办学积极性。钟为集思广益,平时还召集市内各校办学人员到司署集议,共商教育进行之办法。他在日常的办公时间内对来访洽谈公事者,随到随见,对学界同人“关于革新本省学务之条议”深表欢迎。^[18]

教育司这期间还飭各县“仿照省会办法”,在县城召集“热心教育”的“莘莘学子”,自行组织“夏令教员讲习会”。它为此颁行的简章强调:“县长有管学之权,教员有办学之责”,“但求此会成立,便促学务进行”。^[19]遵照教育司之通令和简章,佛山、香山、新会等县先后成立过夏令教员讲习会、所,“邀集县属教员塾师等研究教育改良及进行方法”,^[20]以整顿和促进全属学务为己任。这些教员讲习会、所宣传普及了革命的教育宗旨和方法,团结培养了一批基层教育骨干,对于各地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调动各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钟荣光飭教育司于1913年初拟定薪俸章程,试行各类学校教员按照每周授课时数的多少及每门课的不同单价来计发月薪,按劳付酬。^[21]这激发了各校教师的授课热情,缓解了部分学校师资紧缺的困难。

如上述,钟荣光等人注意在实践中充分调动省、县及各地学校3级领导与广大教师的办学积极性,说明他们已认识到各级教学人员在改革与发展广东教育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群众办学的民主精神。

第四,采取措施排除封建士绅对办学的干扰,力图全面占领各属教育阵地。广东民主

共和政权的建立,虽给了封建绅权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士绅在各地学界仍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象征着科举功名与官爵的旗杆牌匾,充斥于城乡的祖祠和文庙之中,有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尚“沿前清科举遗毒”,将“毕业视同科目,散派报红,谒祖树桅”;^[22]一些士绅凭借其社会关系及功名威望,仍然担任各地学校的校长或校董事,霸收祖尝学谷,阻碍与反对教育改革的进行。为了改变上述情况,教育司进行了3项工作:(一)、狠抓破旧立新的学风校风建设,扫除旗杆牌匾等污秽。钟荣光于1912年6月呈请胡督下令扫除旗杆牌匾等学界污秽,以规正教育界观感和进而整顿学风。其呈文曰:“现在关于观感而为教育前途大障碍者,莫甚于祠庙之牌匾旗杆等物。……科举功名之遗毒,仍然触目皆是……教育大受障碍。应请通飭各属地方官,所有城市乡村祠堂家宅挂有从前举人、进士、翰林一切伪职牌匾旗杆等物,立令销毁,不许遗秽;……尤有请者,近来毕业生新任官长,其中仍有旧习未除,虽不敢公然悬匾树杆,惟尚有书写灯笼,散派报红,售其饰智惊愚之术,应请一体严行禁革,以正民德而维风尚”。胡汉民随即依钟之呈文批转各县知事查照晓喻严禁,令曰:“此等祠庙内之牌匾旗杆及书写灯笼、散派报红陋习,自应一律销毁禁止,以平阶级而正人心”。^[23]此令颁布后,教育司对敢顶风违令者严惩不贷。广州《民生日报》当时对此拍手称颂,指出“亡清科举之头衔,印入学生之脑根,诚教育前途一大障碍也。今都督教育司将亡清旗杆牌匾一律销废,我国学风或有转机乎!”^[24](二)、撤换旧校长,夺回各校的领导权。韶州、肇庆和南雄等属“各中学的校长,向由旧绅盘踞,不知学务,教员多业同类”,其校董也多由所属各县举出的士绅担任。他们食宿在校,“不止耗费薪水,而且扰乱学规”。这些中学由于校长守旧,导致校风不正,学生间常发生土客与县界争斗风潮。钟荣光任司长后下令将它们“收归省立,由司陆续派人接管,厉行改革”;他还不顾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重新委派了顺德、新宁、香山等县中学的校长,从而使“全省中学,稍稍就理”。^[25]平时,教育司对于玩忽职守或不称职的校长,及时给予处分或撤换,以严肃风纪。(三)、改变各属士绅因循陋习霸收祖尝学谷花红的状况。钟荣光于1912年6月呈准都督胡汉民下令:在扫除旗杆牌匾等学界秽物时,一并将“从前谬称绅士占学田领双胙陋习,亦概行取消”。^[26]教育司还专为此训令各县知事务必遵令将祖尝学租花红等各款,“拨作开办家族学校经费。倘有人格卑劣,藉学校毕业之名争收学田花红者,一经查出即将文凭先行撤销,追缴所收学谷,分别惩究,以息争端而重学款”。^[27]茂名、阳春等县的督学局长及东莞、顺德等县的县知事,多能态度鲜明地执行督司的通令;他们或不准士绅再以“养廉”等名目继续收取花红,或强令劣绅退还谷款资助办学,或通飭属内绅耆知悉“嗣后祖尝学田,均留为办学”之用,不得再行占收谷款。^[28]这些县在提取学谷花红等款资助办学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广东教育司排除封建士绅对教育事业干扰破坏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与反抗。各地的封建官绅顽劣势力不仅抓住钟荣光是位基督徒而诬诋他“扬耶抑孔”,借孔圣人的威权来掀风作浪;他们还以煽动裁撤各属督学局、抵制销毁旗杆牌匾、继续霸收祖尝学谷阻学、直接破坏女校和私塾改良等行径,来对抗教育司推行的改革。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好说明教育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革命党人进行教育改革是为了占领文化教育阵地以发展新教育;封建士绅势力反对教育改革则是妄图维持自己在文化教育中的优越地位与实际权益。当时广东新旧势力间围绕教育改革而展开的斗争,

从一侧面反映了那时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特点——即这场变革贯穿了民主共和力量与封建专制势力间的殊死斗争。

前面我们看到,钟荣光领导的广东教育司,曾花了很大气力,并采取过多项措施来整顿改革民初的广东教育。他们期望以此占领全省教育阵地,进而确立资产阶级的教育新体制。尽管在当时民国共和制度昙花一现的政治逆境中,广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他们努力推行的教育改革仍有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价值。这些教育改革措施,不仅表现了广东革命党人敢于用民主共和精神破旧立新、绘制广东教育近代化蓝图的勇气和开拓精神,而且它还为当时广东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和带来新气象。《民生日报》在教育改革初见成效的民元7月间,曾作过以下中肯的评论:“钟荣光自任教育司后,整顿学务,昕夕不遑,固人人所共见”;^[29]“即学务言之,方今从事整顿虽成效未著,而规划之宏大,进步之勇猛,隐然具新气象焉”。^[30]显然,民初广东的教育改革既紧跟了那时“新教育兴、旧教育灭”的社会革新潮流,^[31]又为以后广东教育的发展和走向近代化指出了方向。对此我们应给予肯定的评价。

二、广东正规学校教育的逐渐恢复与发展

正规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主体,担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主要任务。钟荣光主持的广东教育司极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始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整顿、恢复与发展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其他职业教育工作上面,且皆取得成效。

首先,钟荣光和教育司遵照前大总统孙中山关于“教育主义,贵在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的令示,^[32]十分重视并积极采取多项措施致力于恢复与普及广东的小学基础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

教育司规复和发展小学教育的具体措施主要有6项:其一,注重发展幼儿的学前教育,为初小教育打好基础。钟荣光认为办好幼稚园不仅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还能提高幼儿的智商和求知的兴趣。因此他要求广州各区筹款多办幼稚园,“聘保姆主持教育,以为将来初级小学之预备”。^[33]这项工作无疑有利于小学教育的发展提高。其二,发挥各属督学局长在规复发展小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司不仅在督学局章程中规定局长有责任恢复与发展属内的小学教育,而且还令各县督学局应努力尽快“整顿规复已停办之学务”。^[34]各属督学局长在抓好小学教育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广州市督学局长何剑吴努力搞好小学的各项工:“分划市内学区;调查学龄儿童;编制公立市小学名称;次第时时亲往公私各小学校及私塾视察,督令改良;公立学校之教员不职者,撤换之;私立学校之办理腐败、屡令不改者,停闭之。由是谣言纷起,而何不少却”。^[35]茂名督学局长陈卓平接事后力行整顿两级小学堂,使梅录六堡一带的高、初两级小学和红花坡、新洞各小学,先后次第规复。其三,制定有关小学教育的条规,使小学的发展有章可循。教育司规定:“凡公立小学,所有进退校长、规划经费及设置变更等事,由地方学务专员照章呈县知事主之;私立小学,则设董事会主之。无论公立私立学校,校中管理教授一切由校长主之”。^[36]这一规定明确了公立、私立两类学校的行政管理与校长的职责,有利于小学教育的发展。其四,提倡与鼓励兴办女子小学,发展女学教育。教育司遵行孙中山关于“女学

不大兴,不特于女子参预政权不能及格,且于普及教育前途亦有障碍”的指示,^[37]在推广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之同时,又鼓励各地“照章另设女子高等小学”。^[38]在教育司的奖掖下,一些女校先后在广州、顺德、茂名、东莞等地开办起来,如广州第一女师附属的女子小学有学生 188 人,东莞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招收学生 150 多人。它们反映出广东民初共和制度下的女子热心向学。其五,大力奖励私人兴办小学和私塾,尽量普及学龄儿童教育。1912 年 5 月中旬,钟荣光提出“奖励私立学校,以普及教育进行”,^[39]认为应提倡和鼓励各家族、各团体及各个人开办私立小学。在教育司支持下,当时广东的私学甚为发达:“所有小学,十之九皆私立也”,“私塾多于小学数倍,或至二三十倍”。如省城广州市 1913 年有“公立小学四十,私立八十,私塾乃多至七百九十余”。^[40]这说明当时广东教育司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意调动社会力量来办学。其六,注意对公立私立小学进行整改以提高教学质量,力图将之办成新式学校。教育司在这方面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大力改革教学内容。教育司推行用《改良绘图妇孺三四五字书》,代替以往小学通用的《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诗》,以利于儿童接受新知识和培养爱乡爱国思想。教育司在课程设置上还增加了手工、缝纫、农业各课,女校又加开烹饪课,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与生活技能。二是注意整顿公立小学和改良私塾。教育司对清季挂名的两等小学进行甄别,凡“初等学生多者,必令改为初等小学,且新学制初等小学男女同校”。^[41]为了改变封建家族或士绅安插亲友任各属私立学校董事、司事等职的腐败现象,钟荣光在司署内设立了广州私塾改良会,专司指导私塾改良。教育司 1913 年上半年在各地进行过私塾学务调查及注册工作,试图将私塾改革为新制学校。可惜,这项工作由于顽绅等从中作梗而收效不大。

经过教育司如上所述的多方努力,民初广东全省的小学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钟荣光 1913 年论及此时指出:广东“反正前,大中小各种学校,共有一千七百所;反正后纷纷停闭。去年十二月调查,则只小学一项,已达至三千所……今年一月后各有添设,进步不为不速”。^[42]当时广东的小学教育除发展快之外,尚有以下 3 个特点,即一是私立学校数目大大超过公立学校,反映出封建士绅在基层教育阵地上仍有较大优势;二是女学在一些地方得到一定的发展,说明女权在当时有了一定的提高;三是小学教学内容有所创新,教学方法有所改良,不少学校的教学融入了民主精神,而具新式学校面貌。我们对当时广东在小学教育方面取得的显著的成绩,应该加以肯定。

其次,广东教育司注重规复与发展中学基础教育。它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以下 3 项工作:一是整顿府道州属中学,加强直属领导。钟荣光排除罗定、潮州、梅县等属士绅的干扰阻挠,“将从前属道府州所管辖之中学,收归省立”。使当时全省有 14 所中学在教育行政上归司直辖,“以资整顿”。^[43]二是饬令各属督学局规复属内中学开课,准中学归县立或民办。各属督学局长遵令积极恢复治内的中学教育,如茂名督学局长陈卓平努力筹款与整顿学务,令属内高郡中学、崇实中学很快复课开学。当时广东的中学出现了公立民办并存的格局:县立中学共有 14 所,广州还开办有私立中学数所。三是加强中学的教学管理,严格校纪。教育司支持各校处理违犯校纪之学生,又令各中学参照高等职业学校寄宿生的管理办法,令外宿生一律寄居于经警察厅立案之旅舍,以利加强校外管理,减少学生的违纪行为。

由上可知,教育司在发展中学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并不乏改革与创新之

举。它在办学方面坚持省立、县立、私立三方并举，注意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严肃学校的风纪，这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再次，钟荣光领导的教育司认真执行孙中山关于“此时注重师范”教育，可立“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的指令，^[44]努力整顿与发展广东的师范学校教育。钟本人从师范为教育之母，及当时广东严重缺乏师资、影响教育普及的省情出发，认识到从速发展师范教育的战略意义，因而任事之始，即把发展师范教育作为关系到广东教育前途的大事来抓。

广东教育司在发展师范教育方面主要做了两项重要工作：第一，它在整顿省属师范、改革课程设置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广东省属优级师范学校校长黄锡銓不甚通晓教育，又任临时省议会议长，极少过问校务，以致教员随意告假，学生纪律松弛，校风日坏。钟荣光“为振作全省师范起见”，下令将黄辞退，改派留美教育硕士、司教育课长唐萱继任校长职。唐“到校后大行改革，教授管理崭然一新，教员学生感情尤厚，一洗前清官校上下阻隔之弊”。在调整优级师范领导后，教育司又令该校“附设图工科，以养成此二项教员”，为全省各中学提供教学之急需人才。^[45]钟荣光还委派张沅任省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并要求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张遵命训勉全校学生努力学习，决定对不足程度者实行降级重读，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孙中山1912年5月视察女师时称赞该校“办理颇著成效”。^[46]教育司又特饬第一女师招收烹调、缝纫生员，以为将来女校师资之预备，并规定以后无论公立私立女校，都于原有课程外增设此两门课程，由女师分派毕业生“专工教授”，务使女校学生能主持家政。^[47]我们从教育司整改省属师范学校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它对校长作用的高度重视，及其在课程改革方面注重实用的务实精神。

第二，教育司努力增设一些师范学校、附设师范班或简易师范传习所，采取多种渠道尽快培养出更多的教师，以推动各属教育之普及与发展。它的计划大致如下：（一）饬全省未办师范学校的9个学区通力合办师范4所；（二）着各县自行设立女子师范一所，以养成女教员；（三）各学区现有之中学凡能添增经费者开办附设师范班一至二个；（四）饬各县督学局多设单级教员传习所，速成一年毕业，以培养更多的单级小学教员。应该说，教育司增设师范学校的计划是周全的，不过由于经费困难及各属办事不力，再加上不久“二次革命”又失败，这个规划的实施大打折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教育司为全省师范教育的发展制定了蓝图。这充分体现了广东革命党人对兴办师范学校的重视及其对广东教育前途的关注。

最后，广东教育司重视发展培养专门中高级人才的职业学校教育与留学生教育。民初广东的专门职业教育较为发达，军政府的9司1厅3处共办有法政、军事、医学、工艺、农业及实业等类专门职校24所，其中归教育司直辖办理的有广东高等工业学校、中等蚕业学校、农业讲习所、方言学校、商业讲习所、法政专门学校及甲乙两种实业学校等，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多至六七百人”。^[48]教育司在办理上述各专门职业学校时，特别注意加强对外宿生之管理。它专为此咨请警察厅饬学旅馆一律登记注册，规定其专收学生住宿，不许混入闲杂人等，同时它又“开会与各校长议定，不准学生寄宿不立案之旅馆”，学生另租他屋居留须经校方批准。^[49]这项措施在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严肃校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司在办好直辖专门学校和扶持省属各机关办学的同时,为解决广东各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还做了以下两项工作:第一,大力支持私立专门学校的开办与发展。在教育司的支持下,广州私人办职校颇为踊跃,仅私立法政学校就有5所,“学生几达三千人”,^[50]其中规模最大的法政大学学生人数超过900人,宏治、国民两法政学校的人数也均在500人以上,呈现出“学子莘莘,校舍如云”的景象;^[51]除法政外广州私立的专门职业学校尚有:私立医学校5所,药物学校和商业学校各一所,甲乙两种实业学校数所等。它们为当时的广东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第二,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以造就专门高级人才。1912年6月初,广东教育司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杨作桢、陈树人、夏重民、苏怡贞、邓惠芳、曾如凤等人赴日留学。教育司该月还请准都督决定考派留学生“西洋五十人,东洋一百人”,“其中西洋三十五人,东洋三十人”归教育司根据《派遣留学东西洋考试简章》,从本省中学以上毕业的男女生员中考派;其余则为选派“革命有功各学生”,先由教育司考定各科成绩,然后送都督按“果否有功为断,不专在学科成绩之优劣”来确定派出。此外,对于前清广东官私费留学生中因经费不继无法求学者,则“由政府查明补助之,或给全费,或给半费”,以鼓励他们学成回省服务。^[52]教育司1913年度计划的留学生公费款是337000元,占全年度政府所拨教育费898200元的37.5%强,^[53]足见其对留学生教育之重视。从上可以看到:广东革命党人对通过留学渠道来快速造就专门人才寄予厚望。他们在选派留学生的时候既看重学业成绩,更注重留学者对革命事业的态度与贡献。

综前所述可知,广东革命党人对恢复和发展全省的中小学及师范、职业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并以自己切实努力的各项工作开创了民初广东教育的新局面。当时,广东教育司不仅注意各类正规学校数量的恢复与发展,而且更致力于学校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整个教育界面貌的改观。从中我们看到广东革命党人民初用民主革命思想办教育的实干精神,及其力图以教育服务于政治经济改革的一番苦心;教育司长钟荣光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尤多。他1913年曾回忆说:忝任司长14个月,“心思才力,皆以用尽,虽建树无多,未尝不为广东教育立基础”。^[54]粤海关税务司夏立士在10年后报告广东教育发展情况时也说:“回顾过去的历程,我们有趣地注意到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年所出现的良好开端,当时钟荣光先生担任了教育司长”。^[55]可以说,民初广东正规学校教育新出现的发展好势头,为以后广东教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它是广东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三、广东社会教育事业的举办与进行

社会教育通常是指除学校、家庭教育以外的其他各项教育人的事业。广东教育司充分认识到举办社会教育的政治意义,肯定其对提高国民整体政治文化素质、促进政治改革的巨大作用。钟荣光指出:“吾国人民程度幼稚,学校教育效果尚在十年以后,现时年长失学之辈占大多数,不特保守旧习,无望其自行更新,政府有所改革且出而反抗,故无论治标治本,非大行社会教育不可”。^[56]教育司为了增进工农大众的爱国心,特别训令各县知事应设法“务令年长失学之人,普受教育之益”。^[57]显然,教育司将举办社

会教育视为是提高国民文化政治素质的标本兼治的重要途径，认为它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年长失学之辈。

为保证社会教育能够自上而下的广泛推行，教育司认真做好了两项前期工作：（一）、大力加强对社会教育的领导管理。教育司设有社会教育课专管这一工作，并规定各属督学局长有职责主管“半夜小学校、补习小学校”，及“改良剧本、电光影戏、各街坊阅书报处、图书博物馆、各区公共游戏场、体育会、公共演说场、宣讲所、学术研究会、辩论会、白话报”等社会教育事务。^[58]（二）、努力培养全省社会教育的领导骨干队伍，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能力。钟荣光在召开全省教育大会期间专门组织与会代表参观广州市的“宣讲所……教育司署内之教育博物馆”，以及“演说会、恳亲会、游戏会、音乐会、图书手工陈列所、教科书教育品陈列所、阅书报社等”，并让他们观摩“白话新剧、活动影画、幻灯影画”等，^[59]使各县督学局长在社会教育这方面开阔视野、提高认识、学到方法。为培养各地举办社会教育的基层骨干，教育司拟出开办宣讲员练习所之简章，并在广州方言学堂内设立全省宣讲员训练所，用一个月的时间培训出230多名职业宣讲员，充当各地开办宣讲所和进行宣讲活动的得力骨干。它同时还通飭各县设立夏令教员讲习会、所，组织骨干分子拟定设立宣讲所、阅书报社及开办贫儿义塾等社会教育的计划与方案。教育司健全省县两级社会教育职能机构和养成各属社会教育领导骨干的工作，为广东社会教育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设立宣讲所以对国民进行宣讲活动，是广东举办的社会通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司长钟荣光从1912年6月起积极筹办推广宣讲活动。他一面强调“宣讲为改良社会之前锋”，“现在力谋社会教育进行，先经宣讲所入手”，此举既可“藉以启牖愚蒙，涤除旧染，濯入新知”，又可“补助学校，而为将来普及教育之预备”，^[60]从理论上突出开展社会宣讲活动之意义和必要性；他一面又在行动上督促与支持广州市尽早设立宣讲所以为各属倡，并注意推动各属宣讲活动的全面开展。

广州市的宣讲所开办得最早，影响较大。1912年6~7月间，市督学局先后在老城关帝庙、西门内玄妙观和河南海幢寺3处设立了宣讲所，“聘请高贤，逐晚演讲”，^[61]并常辅以军乐吸引听众。各宣讲所还派出宣讲员到东堤街市口、长堤西濠口、嘉属会馆前、财政司、复初社和西关乐善戏院等处作巡回宣讲，每次听讲者数百人。在宣讲所活动的影响推动下，广州戏剧改良社也于10月10日走上街头以演革命活报剧的形式进行宣讲活动，其大旗书写长联曰：“推专制，建共和，愿普众同胞勿忘此日；掷头颅，糜血肉，知艰难革命须念前人”，^[62]用以教育国民。

各县宣讲所开展的宣讲活动也造成一定的声势。教育司于1912年8月省宣讲训练所学员毕业分赴各属时，颁行《宣讲所简章》9条，规定“凡有督学局之处，即须设一宣讲所，以次进行，各乡愈多愈妙”；宣讲题目由教育司编定；宣讲时“全用白话，简质明白，以人人能晓为主”；宣讲的方式可固定一地演讲，也可“由督学局选派讲员，分赴市场、圩场及一带村落巡回讲演”；宣讲之时间、地点由讲员“体察情形定之”。^[63]这是指导各属宣讲所开展活动的重要文件。在开设新宣讲所的同时，教育司为节樽费用又令前清“各属城乡善堂凡有宣讲者，就照常规复，未有宣讲者应即添设……与督学局所派讲员互相策应”。^[64]在教育司的督令下，各属的宣讲所陆续开办和进行了一系列的宣讲活动。

据现在资料统计,民初广东设立的宣讲所到1913年“二次革命”前共有198所,它们分布在广州和全省绝大部分的县镇。^[65]各属宣讲活动的题目虽不尽相同,但其内容却要求“务与改良社会宗旨不相违背”;“或民国常识、或现今大势、或先贤言论、或乡土事迹”,都在讲述内容之列。^[66]这项活动在唤起民众认同支持民主共和制度、促进社会政治改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设阅书报社,也是广东举办的社会通俗教育的内容之一。教育司于1912年6月拟出《阅书报社简章》9条,作为举办这项社会教育事业的法规。它规定阅书报社之设,“以输新知”、“开通民智”为宗旨,“各处宣讲所必当附设一社”,所购书报等“以合于共和国民者为要”,社内“严禁赌博及一切范围外之事”;它还对阅书报社的管理开放作了具体的规定。^[67]此简章颁行后,各地的阅书报社相继开设和规复起来。它们有的是属于官办的,有的是由街道或团体设立的,有的是个人出资开设的。到“二次革命”前夕,广东全省共设有阅书报社计159处。^[68]这些阅书报社皆不同程度地陈列有新书报,供人们暇时纵览,平时还兼举办一些宣讲会。它们在向国民灌输新知识、宣传民主共和与破除迷信旧习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设立幼儿及成人义务补习学校,是广东举办的社会通俗教育的又一内容。教育司注意调动社会的办学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大力支持热心社会教育的革命党人、工农团体及学校举办夜校或义塾,实行义务教育。当时的补习学校如按就学的对象来划分,大致有3类:一是为失学的贫儿举办的识字班;二是为失学的成年工农群众举办的夜校;三是专为成年妇女开办的补习学校。据教育部1913年4月的统计,广东当时共有简易识字学塾54所,半夜学校53所,两类学校平均每校招收学生约120名。^[69]这些学校为贫困幼儿及失学的成人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在一定范围内弥补了正规学校教育之不足。它们在扫除文盲、开启民智和增进道德方面发挥了作用。

积极开展宣讲活动、广设阅书报社和大力支持办好义学,是广东教育司在推行社会通俗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主要工作。这3项工作在较广的社会层面上宣传了民主共和精神和新思想、新知识,对启牖愚蒙,改良社会与提高国民的政治文化道德素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厘正礼俗,涤除旧染与转变社会风气,是民初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司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其一,禁用宣扬封建迷信的旧通书,颁行通用阳历的“同俗历书”。教育司鉴于旧通书宣扬鬼神、吉凶、禁忌等封建迷信,闭塞民智,蛊惑人心,与民国精神相抵触,遂于1912年6月下令禁止其刻印,而另颁行当年中央推出的新历书供人印销。该新历书“添入世界之新事业,本国之新建设,凡为人民所当知者,附于日历之前后”。^[70]12月下旬,教育司请准都督颁行“破除陋见、输入常识”的1913年新历书样本,并通告曰:“此项历书应用甚广,而本无多,应准商民照式翻印,除内中图说准其通融删去外,其余体例均不得任意增减”。^[71]历书是民间流通的一种读物,教育司三令五申强调废除旧通书而改而新历书,表明了它革除封建迷信陋习、向民众灌输科学新知与民国常识的决心。其二,通令学校改用阳历和遵省府规定取消传统节日休假。1912年冬,教育司发现潮州青年同志会会长孙廷臣递呈的宣讲所简章中有关于端午节、中秋节放假之规定,即批令曰:“现已遵用阳历,不应再有此假期,将来续订学校章程时务宜注意”。^[72]1913年春节前半个月,教

育司通飭各校曰：“民国改用阳历，系奉总统令颁行；学校休假日，系经教育部规定。……各校学生有于阴历新年告假者，一概不准，其有未经准假而擅去者，即以违背校规论，由校长严予惩戒，藉以尊崇民国正朔，革除旧染污习。……令行布告各学校及私塾员生一体遵照”。^[73]这一告令虽有违风俗民情，但其意是望学校师生在遵用阳历、转变社会风俗方面做出表率，用心良苦。此外，教育司还在支持有识之士组织维持风俗会以销毁淫书画，及组织婚姻劝导改良会以倡导自由恋爱与文明结婚等方面，做了些工作。这些皆有利于改良封建陋习和树立社会新风气。

科学艺术设施的建设及文体活动的开展，当时也属社会教育的范畴。教育司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教育司在署内设有广东教育博物馆，馆内陈列的动植物与矿物标本、生理模型、及声光电化实验仪器象显微镜、发报机等，都令参观者获得科技知识和耳目一新。在兴建图书馆以普及知识、开通民智方面，教育司署内设有图书陈列室对外开放；它征得督府同意于1913年4月用12万元经费扩充与丰富了广东图书馆的藏书，该馆每日平均约有300位读者；^[74]广东各属还办有通俗图书馆6座，藏书量为1800余册，平均每天到馆阅书报者有200人左右。^[75]在开展体育活动以振奋军国民精神方面，教育司在司署内辟有运动场与球场供人锻炼；它领导的省教育大会附设有游艺会，“以邀集各校学生于暑假间武演各种技术、务期发扬体育、振起尚武精神为宗旨”；^[76]它还在优级师范举办过暑假运动会和广东独立周年运动会。在举办音乐会陶冶国民情操美感方面，教育司强调“音乐一道足以转移风俗，陶淑性情，于民国道德美感教育极有关系，而发扬蹈厉之处，尤足振起军国民教育之精神”，望各校师生等将之“引为重要之学科”。^[77]它在司署内建有音乐亭，定期请军乐队前来演奏，供人观赏；它组织了音乐团体“乐社”，吸收爱好音乐者参加；它在1913年4月2日开办了春假音乐会，到会者有军乐队、各校师生及来宾六七百人，气氛空前热烈。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司的上述工作对普及科学知识和促进国民的身心健康，皆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广东教育司民初推行的社会教育，包括了社会通俗教育，厘正礼教风俗及开展科学文体活动内容。它是当时整个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社会教育事业的兴办与发展，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与塑造国民政治素质的关注和重视，体现了他们力图以此来破旧立新、移风易俗，进而动员国民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精神。尽管由于经费困难，有些社会教育项目如改良年画、办通俗报纸及放映幻灯影画等没能举办，但那时已开办的各项社会教育事业都取得一定成效，它们在启迪开导民智、提高民众的文化道德素质、推动社会风气进步、及增强国民的共和观念、巩固新生民主政权和弥补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看到：广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1912~1913年“二次革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曾采取有力措施对广东的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在恢复与发展全省的正规学校教育和举办社会教育方面，做了很多艰苦扎实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们在改革与发展广东教育的实践斗争中，表现出其顺应那时新旧变革历史潮流，力图以新式教育服务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开拓实干精神，及其敢于破旧立新和同封建顽劣势力进行斗争民主革命气魄。广东军政府教育司同人当时推行的旨在建立资产阶级教育新体制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为广东教育走向近代化指出了方向和绘制出初

步蓝图；他们努力恢复与发展全省正规学校教育及其所取得的成效，使广东各地的教育界不同程度地经受过民主共和精神的洗礼而出现了新气象与新面貌；他们自上而下推行的各项社会教育事业，有助于广东民主共和思想的普及、全民政治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与进步。所有这些说明，民初广东的新教育在通向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它刚刚起步就遭到旧官绅等封建势力的阻挠，则预示着广东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是曲折艰难的。

〔责任编辑 赵洪艳〕

注：

- 〔1〕 《顺德学务之衰退》，《民生日报》1912年5月21日。
- 〔2〕 《广东大都督批》，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057/339号)。
- 〔3〕〔5〕〔7〕〔16〕〔25〕〔35〕〔36〕〔38〕〔40〕〔41〕〔42〕〔43〕〔45〕〔49〕〔50〕〔52〕〔53〕〔54〕〔56〕〔59〕〔70〕 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广州版，第15、28、28、18、27、16~17、25、26、24~25、25~26、25、27、22、23~24、29、29~31、30、31、16、19、20页。
- 〔4〕 《外人称教育之得人》，《民生日报》1912年6月15日。
- 〔6〕〔64〕 《令各县知事劝导善堂耆董选员宣讲文》，广东档案馆藏《广东公报》(181/142)。
- 〔8〕 《争祀孔者可以慰矣》，《民生日报》1912年9月23日。
- 〔9〕 《女子体育学校将成立》，《民生日报》1912年5月9日。
- 〔10〕 《广东人之广东》，第26页；《培女学之根本》，《民生日报》1912年6月15日。
- 〔11〕〔15〕〔58〕 《广东督学局章程》，《民生日报》1912年6月19~21日。
- 〔12〕 《男女教育之平等》，《民生日报》1912年7月2日。
- 〔13〕 《教育司拟办之事》、《教育司职员一览表》，《民生日报》1912年5月30日，6月4日。
- 〔14〕 《广州市督学局长通告》，《民生日报》1912年6月21日。
- 〔17〕 《广东全省教育大会简章》、《教育司最先入手之办法》，《民生日报》1912年6月12日、28日。
- 〔18〕 《求见教育司须知》、《教育司裁减无谓空文》，《民生日报》1912年6月12日，5月23日。
- 〔19〕 《飭办各属夏令教员讲习所》，《民生日报》1912年6月27日。
- 〔20〕 《香山整顿学务之进行》，《民生日报》1912年8月10日。
- 〔21〕 参见《暂行教员薪俸章程》，《民立报》1913年1月30日。
- 〔22〕 《川粤桂滇等四省教育报告》，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057/50)。
- 〔23〕〔26〕 《为学界前途扫尽污秽》，《民生日报》1912年6月21日。
- 〔24〕 《旗杆牌匾一扫而清快哉》，《民生日报》1912年6月22日。
- 〔27〕 《令各县知事公布所属学田花红等款遵令提办族学禁藉名争收文》，广东档案馆藏《广东公报》(231/32)。
- 〔28〕 《霸收书田花红者看看》，《民生日报》1913年5月26日。
- 〔29〕 《钟荣光四面受敌之原因》，《民生日报》1912年7月16日。
- 〔30〕 《胡督去粤之理由及影响》，《民生日报》1912年7月12日。
- 〔31〕 《新陈代谢》，《时报》1912年3月5日。
- 〔32〕〔41〕 《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253~254页。
- 〔33〕 《教育司注重幼儿教育》，《民生日报》1912年6月7日。
- 〔34〕 《教育司推行教育》，《民生日报》1912年6月1日。

- [37][46] 《孙先生注重女学》，《民生日报》1912年5月10日。
- [39] 《教育司真是平等》，《民生日报》1912年5月14日。
- [47] 《培女学之根本》，《民生日报》1912年6月15日。
- [48] 《本市街弄局所学校寺院一览表》、《教育司直辖学校调查表》，《民生日报》1912年8月12日，6月25日；《广东人之广东》，第29页。
- [51] 《粤人做官思想之发达》，《民生日报》1912年7月9日。
- [55] 张富强、乐正等译编：《广州现代化历程》，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 [57] 《为年长失学者谋教育》，《民生日报》1913年7月9日。
- [60] 《令各县知事劝导善堂耆董选员宣讲文》，广东档案馆藏《广东公报》(181/142)；《商借八邑会馆为宣讲所》，《民生日报》1912年6月19日。
- [61] 《广州市督学局布告》，《民生日报》1912年7月4日。
- [62] 《优界改良社滑稽写生队之特色》，《民生日报》1912年10月12日。
- [63] 《教育司拟定宣讲所简章》，《民生日报》1912年9月12日。
- [65][68] 《教育公报》第6册，“报告栏”第20页。
- [66] 《广州市督学局布告》、《教育司拟定宣讲所简章》，《民生日报》1912年7月4日，9月12日。
- [67] 《教育司拟定阅书报社简章》，《民生日报》1912年6月19日。
- [69][74][75] 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0辑，第207、209、171、174页。
- [71] 《改良历书将有样本颁发》，《颁行历书》，《民生日报》1912年7月1日，10月26日。
- [72] 《教育司批》，《民生日报》1912年12月20日。
- [73] 《不准学生于阴历新年告假》，《民生日报》1913年1月17日。
- [76] 《广东教育大会附设游艺会简章》，《民生日报》1912年6月28日。
- [77] 《短期之音乐研究会》，《民生日报》1913年3月24日。

Education in Guangdo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Xingl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ly found data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res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systematically and discusses comprehensively the education reform launched by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formal education on the campus and the social education of that period, showing how the education reform promot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new bourgeois education system in Guangdong. At that time, the reconstruct and development of formal education at primary school, high school, normal school and vocational school, and the spread of social education with popular education and ritual education as its core enabled the education in Guangdong to step on the road to modern democracy.